

文章编号: 1673-0453(2016)03-0068-0007

# 吴语特殊语序初探

卜杭宾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摘要:** 吴语是中国第二大方言,其语音、词汇、语法与普通话存在很大差异。目前对于吴语特殊语序的研究比较分散。以普通话为参照,从复合词的异序现象、话题优先的特点、宾语的位置和后置状语的位置四方面探究吴语的特殊语序现象及其形成的历史因素,由此可知吴语在语序上极具地域特色,众多语序现象和其他南方方言一样承袭自古汉语。这对于进一步描述吴语语法特征和建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亦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吴语;异序;话题优先;宾语;后置状语

中图分类号: H17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148/j.cnki.cn32-1743/c.2016.03.010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肇端于20世纪20年代赵元任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该文对三地的方言语法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比较与研究,可谓开方言语法研究之先河。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成果日臻丰富。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了多部论述各个方言点的语法专著,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吴语,又称吴方言、江浙话,是中国境内第二大方言,地跨苏、沪、浙、皖、闽五省市,分北部吴语和南部吴语。吴语的语音与普通话差别较大,最大的特点是其保留了古汉语的全浊声母。吴语的词汇大都源自古汉语,可在历代典籍中找到例证。虽然吴语的语法相对稳定,但是与普通话相比仍存在不少差异。学界通常认为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是现代吴语研究的奠基之作。该书是中国首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体例完整,脉络清晰,并附有极其丰富的语料,至今仍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其实,狭义上的吴语研究甚至可上溯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胡文英的吴语词汇研究著作《吴下方言考》和清光绪四年(1878)范寅辑录的绍兴方言谣谚集《越谚》。当代吴语研究专家钱乃荣更是沿着赵元任的足迹,分两次走访了40多个吴语方言点(包括当年赵元任走过的33个方言点),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

成了长达170多万字的《当代吴语研究》。可以说,近百年来吴语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对构建汉语方言研究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赵元任曾指出:“在文法方面,中国各地方言最有统一性,除去一些小的分歧,像吴语、粤语的间接宾语放在直接宾语之前,而国语(跟英语一样)正好相反,还有南方的能性补语(potential complements)的否定次序略有不同等等。另外再除去一些词尾跟语助词的不同,其实各方言之间还可以找出相当接近的对应。”<sup>[1]</sup>因此,《现代吴语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吴语的语音和词汇现象,对吴语语法的研究仅限于对话助词的分析。方言学家李如龙也认为“学者们长期以来都认为汉语方言在语法方面相互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很大”<sup>[2]</sup>。然而,目前的方言语法研究相对于语音、词汇的研究而言仍显薄弱,对很多语法现象都缺乏深入挖掘,能够全面探究某地语法的专著很少,基于共同语语法研究的论著就更加罕见。钱乃荣的《上海语法》、徐烈炯和邵敬敏合著的《上海方言语法研究》以及李小凡的《苏州方言语法研究》等著作大都是对某个方言点的语法研究,缺乏对吴语语法体系的宏观把握。此外,吴语区各地县志对语法的描述也相当粗略,很多语法特点只有寥寥数句,有待进一步补充。

语序在语法手段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刘

收稿日期: 2016-06-10

作者简介: 卜杭宾(1990—),男,浙江萧山人,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丹青认为“当代句法类型学的核心问题是语序”<sup>[3]</sup>,并将一种语言最重要的语序类型分为小句结构语序和介词类型两类。虽然中国各地方言在语序上和普通话差别不是很大,尤其是一些基本语序,但是特定的句法反映特定的语法关系,吴语诸多特殊语序现象仍值得我们探究。目前关于吴语语序的研究主要有刘丹青的《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朱婷婷的《萧山方言的特殊语序》和林素娥的《湘语与吴语语序类型比较研究》。《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一文的作者运用学界有关语言类型学的最新理论及研究成果对汉语和吴语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内容涵盖语言类型学述要、语序类型学的发展、语序类型学中的介词和连词参项、介词语义学与语法化理论等<sup>[4]</sup><sup>12</sup>。《萧山方言的特殊语序》的作者认为萧山方言词的语素顺序、受事成分语序、副词语序、可能补语带宾语语序、双宾语语序和介词类型与普通话略有不同,与汉语其他方言的语序也有差异。从类型学的角度看,萧山方言语序具有东南方言的特色,但也受官话方言的影响<sup>[5]</sup>。林素娥的博士论文从现代原型范畴理论和语言系统层级性出发,提出基于语序原型的类型相似度比较研究,考察了湘语与吴语语序类型及和谐度的不同表现<sup>[6]</sup>。在本文中,笔者以汉语共同语为参照,着重从复合词的异序现象、话题优先的特点、宾语的位置和后置状语的位置四方面探讨吴语充满地域特色的语序现象及其形成的历史因素。这对于系统描述吴语语法特征和建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有重要意义。

## 一、复合词的异序现象

吴语的复合词中存在着大量与普通话相反的词序现象。例如:

吴语:	人客	闹热	菜蔬	欢喜	气力
普通话:	客人	热闹	蔬菜	喜欢	力气
吴语:	鸡娘	狗婆	猪婆	牛牯	猪郎
普通话:	母鸡	母狗	母猪	母牛	种猪

上述所举吴语词汇均属“逆序词”或“异序词”,即与普通话相比,前后两个语素的词序刚好相反。其实,南方各大方言词汇也存在这种异序现象,例如闽方言中的“土沙(沙土)、下底(底下)、风台(台风)、漏泄(泄漏)”,以及客家话中的“菜干(干菜)、尘灰(灰尘)”<sup>[7]</sup>。

学界对南方方言中的异序现象已有较多讨

论。有学者认为,“人客”“猪婆”等异序词属于“修饰成分后置”现象或者“正偏式”结构,可能与壮侗语有关,因为古壮侗语所有定语都置于中心词之后。当然,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汉语中不存在“中心语+修饰语”的结构,如项梦冰综合各家观点论证这种现象是正常的“修饰语+中心语”词序,不应将其看成“修饰语后置”<sup>[7]</sup>。

张巍在《中古汉语同素逆序词演变研究》一文中从多角度对古汉语中的同素逆序词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联合式由两个意义相同、相近或相反的语素构成。这一类同素逆序词数量最大、最常见。语素序位变化以后,结构不变;基本意义大部分不变,有的则发生变化”<sup>[8]</sup><sup>186-187</sup>。笔者认为“欢喜”“闹热”“人客”等词皆可归为联合式。同时,征引典籍文献可以发现,这些用法古已有之,并非南方方言(包括吴语)自创的语法形式。下面以“欢喜”一词举例说明。

关汉卿《金线池》第三折:“他真个不欢喜我了,更待干罢!只得到俺哥哥那里告他去。”《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商小姐见兄弟小时母子伶仃,而今长大知事,也自欢喜他。”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一卷:“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问知是罗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辈了,那一个不欢喜。”其实“欢喜”一词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只是在先秦典籍中“欢喜”作“高兴、喜悦”解。例如,《战国策·中山策》:“长平之事,秦军大败,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

可见,“欢喜”一词最早见于典籍始于先秦,下溯至明清,其意义也因时而变。该词符合张巍对于联合式词语语义变化的论述。另外,在近现代一些江浙籍作家作品中,“欢喜”一词也屡见不鲜。

再如“人客”一词,在典籍中也很常见。例如,《国语·越语下》:“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三国志·吴志·周瑜传》:“(孙权)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

可见,早在战国时代已有“人客”一词,而在唐代作品中也经常出现“客人”“人客”并存现象。例如,杜甫《遣兴》诗:“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白居易《昭国闲居》诗:“时暑放朝参,天阴人客少。”鲍溶《周先生画洞庭歌》:“客人似得婵娟梦。”

由此可知,“客人”一词最迟在唐朝就有了,而

被认为异序的“人客”一词反而要早。在《红楼梦》中也有“人客”和“客人”并用现象。

相较而言,动物性别词后置的现象比较复杂。袁家骅认为“这种构词法跟壮侗语族各语言(壮、黎、侗、水语等)是很接近的”<sup>[9]</sup>。应该说,完全符合南方方言动物性别词后置的相关典籍比较少。在上古汉语中有一种罕见的“正偏式”结构,即:“大名冠小名”,如“鸟鸟”(《左传》)“鱼鲋”“虫蝗”(《礼记》)和“城濮”(《左传》地名)等,再如上古汉语中的人名“帝尧”“后稷”“公刘”等。这些都与汉语偏正式结构相悖<sup>[8]186-187</sup>。这似乎可以用来解释南方方言中动物性别词的后置现象,如“猪婆”“牛牯”等词,其中心语是“猪”“牛”,修饰语是表示性别的“婆”“牯”等。闽粤方言中的“风台”“菜干”等词亦可作此解释。但是,丁邦新也指出,我们也不是非得将“雄”“公”“母”等后置词解释为形容词,也可以视为名词<sup>[10]</sup>。正如英文中有President Bush(布什总统)、city proper(城区)、secretary general(秘书长)、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等说法,但我们不能就此论断英语是修饰语后置的语言,英语的这些说法实际上是受法语的影响。考察整个汉语发展史可知,南方方言的这种性别词后置也可视为古已有之,不一定与壮侗语有关。因此,笔者认为,对这种动物性别词后置现象,很难就此论断它是属于“中心语+修饰语”结构还是属于非汉语现有语法范畴,将其称为一种特殊的修饰语较为妥当。诚如张巍所言:“作为SVO语言,汉语名词短语修饰语一概前置的类型学特点及其内部因素、和谐语序也是我们应加以考虑的,在没有充分且令人信服的研究材料的情况下,构词法中还是慎立‘中心语+修饰语’类型为妥。”<sup>[7]</sup>

吴语的异序词现象,与语音、词汇、语法、修辞以及复杂的文化心理密切相关,我们不能因其语序与共同语语法结构相左,就脱离和谐的语序规则而将其冠之以新的语法类型。同时,我们也要客观真实地描述各类语法现象。项梦冰认为“人客”“客人”实际含义有区别,比如“人客不能受数量词限制”<sup>[7]</sup>,而在吴语的实际用法中并无这种区别。此外,项梦冰认为“人客”一类的异序词稍加调整即可解释为偏正结构。这显然忽视了方言的约定俗成,更何况“人客”和“客人”等词皆有典可考,目前仍用于吴语的日常交流。这些词汇不管语序如何,都是在古汉语中确实确实存在的,只是形成时期不同,

其语序也在历史演进中发生了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人客”“菜蔬”等词汇目前已趋同于普通话语序,这亦符合各地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中异序词在新派口语中多为共同语取代的趋势。

## 二、话题优先的特点

话题(topic),又称主题。自赵元任首次以话题和述题的关系指称汉语主谓关系以来,汉语话题逐渐受到学界关注<sup>[6]</sup>。学者刘丹青认为,“话题不仅是一种话语成分,更是一种常规的句法位置”<sup>[3]</sup>。试比较下列吴语例句与对应的普通话:

你黄鱼买不买?我黄鱼不买。(你买黄鱼吗?我不买黄鱼。)

我黄鱼不买,他黄鱼也不买。(我不买黄鱼,他也不买黄鱼。)

尔碗借两个我用用。(你借我两个碗用用。)

我饭吃爻一碗。(饭我吃了一碗。)

可见,吴语中的受事成分位于谓语动词前,主要充当主语后的次话题而不是主语前的主话题。其实在真实的语料库中并不存在“饭我吃了一碗”一类的句子,虽然受事成分也可以放在主语前。这一点和普通话不同。同样,吴语的是非问句也往往使用TV(话题+谓语)结构,体现其受事话题结构的特点,例如:

伊香烟勿吃。(他不抽烟。)

依香烟吃伐?(你抽烟吗?)

依苹果吃勿吃?(你吃不吃苹果?)

尔饭吃未?(你吃饭没?)

相比而言,吴语的话题优先特点更加突出,话题成为了一种更常规的句法成分。

另外,在话题优先的语言中相关句式会有所消长。以把字句为例,与普通话相比,吴语中把字句的使用频率很低,吴语不使用“把”字句表示处置意义,而使用“拿”或者“则”(吴语临绍小片)。但是,吴语中更常见的是把受事成分提到句首或者动词之前。例如:

夯块西瓜我则伊吃还哉。(我把那块西瓜吃掉了。)

日历我挂好勒啦墙头浪。(我把日历在墙上挂好了。)

如果动词后面没有其他成分,则要在宾语位置后接第三人称复指,即句中有代词或者别的词

与它同指,如上海话中的“伊”、苏州话中的“俚”和诸暨话中的“渠(其)”等。<sup>①</sup>例如:

地板拖拖伊。(把地板拖拖。)

格这鸡杀脱伊。(把这只鸡杀了。)

格些老酒吃脱伊。(把这些酒喝光。)

刘丹青将其归结为“受事性TV结构、特别是STV结构的发达”<sup>[3]</sup>。因此,相对于普通话而言,吴语的把字句使用频率很低。

吴语话题优先的特点并非是受普通话影响的结果。在晚清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中,吴语这种话题优先的句子俯拾即是。如:

出局衣裳,无?姆阿曾拨来耐?(出局的衣服,妈妈给你了吗?)

鸦片烟倪勳吃。(我们不要吸鸦片烟。)

物事倪倒勿要啥哉,不过帐浪一对嵌名字戒指要八钱重啻。(我们倒不要什么东西了,只是账上一对嵌名字的戒指要重八钱呢。)

陆秀宝搭,耐为啥连浪去吃酒?(你为啥连着去陆秀宝那儿喝酒?)<sup>[11]</sup>

吴语的话题句,通常会在话题句后紧跟一个助词“末”,这样就更体现话题与后面核心句的关系。例如:

去末去,饭是弗吃葛。(去可以,但是我不吃饭。)

便宜末便宜,买是买弗起葛。(是很便宜,但是要我买我是买不起的。)

普通话中也有很多话题优先的句子,但是吴语的话题选择大都比较随意,话题位置也比较随意,有些可以还原到普通话对应的位置。更多时候,由于语言的约定俗成,这种特点便尤为明显。此外,受普通话影响,很多时候新派也倾向于采用普通话话题模式,即按照主谓句的常见形式展开会话。

### 三、宾语的位置

#### (一) 双宾语位置

普通话中动词后面出现两个宾语的句子称为双宾语。双宾语由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组成。许

多语言中都存在双宾语现象,如英语中的“I give him a book”和“I give a book to him”。普通话中一般使用“V+O1+O2”(O1为间接宾语,O2为直接宾语)的结构。双宾语的动词一般带有给予或求取的意思,也可表示询问、接受。例如:

我给他一本书。

给我一支笔!

他借我十块钱。

这种句式是最常见的,在吴语中也有和普通话相对应的说法:

我拨伊(一)本书。

拨我(一)支笔!

伊借我十块洋钿。

但是吴语中还有种普通话中没有的“V+O2+O1”结构,即间接宾语放在直接宾语后面。例如:

给我一张纸。

送我一本书。

上海:拨张纸头我。

送本书我。

嘉兴:拨张纸头我。

送本书我。

绍兴:拨张纸头我。

送本书我。

温州:哈张纸我。

送本书我。

平阳:客张纸我。

送本书我。<sup>[12]245</sup>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吴语中的动词带双宾语,间接宾语可放在直接宾语之前,也可以置后,而普通话总是采用第一种格式。但同时要注意的是,这种结构中的间接宾语也只能是人称代词,不能是一般的名词<sup>[13]210</sup>,例如:

伊送支笔我。

伊送一支笔张明。

我借件衣裳伊。

我借件衣裳张明。

上面错误的句子完全可以转化成正确的吴语说法,即吴语中同样常见的“V+O2+拨(拨拉)+O1”结构,或者是“V+拨(拨拉)+O1+O2”结构。例如:

伊送一支笔拨张明。(伊借拨张明一支笔。)

我借件衣裳拨张明。(我借拨张明一件衣裳。)

需要指出的是,吴语中的“拨”和普通话中“给”的用法基本相同,但吴语中不存在“给”的说法,只是介词的使用不同而已。另外,吴语中还存在着一种混用现象,也就是“拨+人+物”与“拨+物+人”

<sup>①</sup> 吴语人称代词系统比较复杂,此处不赘述。另外,在吴语临绍小片地区,这种结构是将复指人称提前。例如,萧山话:还有格点点菜么吃伊完(还有这么点菜,把它吃光);绍兴话:小人惯伊完(把小孩扔掉);诸暨话:格点饭,搭其吃掉(这么点饭,把它吃掉)。

的混用,即“拨+O2+拨+O1”结构。例如:

上海话:我拨本书拨侬。(我给你一本书。)

苏州话:我拨点药拨俚吃。(我给他吃点药。)<sup>[14]</sup>

普通话基本上采用“V+O1+O2”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由于受北方话的影响,吴语区也倾向使用“V+O1+O2”的说法,“V+O2+O1”的老派说法已趋于式微。这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当代吴语语序向共同语靠近的趋势。同时,吴语区的人在普通话交流中经常会说出类似“给张纸我”的病句,反映了吴语在语序上对普通话学习者的影响。

## (二) 可能补语与宾语的位置

可能补语表示可能或者不可能,普通话的语序是“V+得/不+C+O”,例如:搬不动它、找不到你、看不见我、吃得下饭。

吴语中的肯定表达一般也采用普通话的语序,当然也有“寻得我着,看得伊着”的说法,但在否定表达中,吴语往往使用“V+O+勿+C”的结构。例如:

看伊勿起(看不起他)

碰伊勿着(碰不着他)

打侬勿过(打不过你)

搬伊勿动(搬不动它)

吴语中还存在着一种“V+勿+O+C”的结构,只是这种表达没有上一种常见。例如:

葛顶桌子搬勿伊动咯。(这张桌子是搬不动它的。)

我力气蛮大另外人打勿我过咯。(我力气很大其他人是打不过我的。)<sup>[13]210</sup>

对于后两种普通话中所没有的语序,朱德熙指出,“宾语放在述语之后(拉他不住)或‘得’字之后(岂能瞒得我过)是宋元白话的格式”<sup>[15]132</sup>。这种句式尤多见于明清言情小说中。例如:

爹妈从小管他下不的,今日哪里留他得住?《醒世恒言》

我们隐居深山,只道可以全生远害,不料那权臣还放我不过。《蝴蝶媒》

不如往海宁县中住下,那个寻得我着!《欢喜冤家》

亏那真正撒屁的,但得手起,也来啮

我。《笑林广记》<sup>[16]</sup>

朱婷婷认为造成这种语序的主要原因是宾语的音节长度和性质。在萧山方言中,宾语为一般名词,通常采用“O+V+勿/得+C”<sup>[5]</sup>的语序。吴子慧也指出“V+O+勿+C”有两个使用条件,“第一,否定式。第二,宾语是人称代词……但是不能用其他的词语”<sup>[13]210</sup>。上述典籍如“怪爹娘不得”“只怕为妻的叫奶奶不起”证明关于宾语的论述是不全面的,宾语不管是人称代词还是一般名词都可以使用“V+O+勿+C”语序,只是使用频率有高低而已。其实普通话中除了个别熟语如“放心不下”“吃罪不起”“担待不起”之外已经很少这样使用了,而吴语新派和老派口语中仍在大量使用“V+O+勿+C”语序。

## 四、后置状语

普通话中的副词一般只能前置于修饰、限制的动词或形容词,但在吴语中存在一些副词后置的例子,有的只能后置,有的则可前可后。例如普通话中“快”常常前置于动词,而吴语习惯将“快”后置。如:

饭好未?——饭好快哉。

冻也冻煞快。

放暑假快哉。

吴子慧认为,“表示‘即将’语义的‘快’不一定放在中心词后面,也可以放在前面,但没有放在后面那样多,这一点与上海方言不同”<sup>[13]213</sup>。然而这与实际不符,因为绍兴县志方言卷中也是习惯将“快”后置。应该说,太湖片区吴语普遍说“到快哉”,当然也不排除受普通话影响将“快”前置的例子。

此外,在粤语等南方方言中有“你食碗添”的说法,总是将“添”放在句末。浙南吴语中也有这种现象,常将“添”或“凑”放在动词补语后,当然也可在动词前加“再”,在补语后加“添(凑)”。如:

吃碗添。(再吃碗添。)

嬉下添。(再嬉下添。)

坐歇添。(再坐歇添。)

黄家教、詹伯慧认为,“广州话作副词的这个‘添’字是从动词‘增添’的原义转化而来的”<sup>[17]</sup>。“添”虽然是带有数量意义的副词,但还隐含着“增添”的意思。比如“来碗添”即“增加一碗饭”,是动词虚化的结果。绍兴话中也出现了“吃碗添→再吃碗添→再吃碗”的趋势,这一趋势体现了普通话对其语

法的影响,而今第一种说法已经不多了。和“添”用法类似的还有浙南吴语放在句末的“先”“起”,这种用法也是与粤语等南方方言一致的。例如:

温州:你走先。(你先走。)

金华:依去起,我等记再去。(你先去,我等会儿再去。)

绍兴、萧山等地的方言在表示“重新、再”时,会将“过”放在动词后面,表示某事需要重做以达到满意的程度。“过”在普通话中为动态助词,在绍兴萧山方言中则常常后置。如:

格毛考勿好么下毛考过。(这次考不好下次再考。)

格件毛线衫挑得勿好,拆完挑过。  
(这件毛衣织的不好,拆了重织。)

当然,和绍兴话“添”的用法一样,新派绍兴话受普通话影响往往使用“再……过”或者“再”的结构,如上句的“格毛考勿好么下毛考过”也可说成“格毛考勿好么下毛再考过”。

普通话中表示程度的副词一般只用少数几个词,如“很”“极”“十分”等,并且只能前置,“很”字后置必须加“得”。吴语的后置副词除了前面讨论过的,还有“煞”“得来”“来西”等。

而在温州话等南部吴语中后置词更加丰富。如:

杭州游嬉个人多显。(杭州游玩的人很多。)

乡下个茅坑臭倒。(乡下的厕所臭极了。)

佢屋里个生活爽最。(他家里的生活最舒服了。)

昨夜的电影好笑死。(昨晚的电影好笑极了。)

该起事干佢钟好尽。(这件事情他干得很好。)<sup>[12]244</sup>

刘丹青认为,“后置状语似乎显示了吴语更强的VO型语言特征,这与吴语比普通话更强的动词居后倾向不符”<sup>[4]191</sup>。显而易见,无论是北部吴语的“快”还是南部吴语的“先”“起”,都必须依靠其他成分才能成句,不像前置副词那么自由。骆锤炼指出,“‘添’直接修饰动词而不带数量成分在温州话中广泛存在”<sup>[18]</sup>,并称在两种情况下不带数量成分:一是在祈使句中,二是在内嵌句中<sup>[18]</sup>。不管怎么说,吴语和南方方言如粤语这些状语后置现象,格式比较固定,可能也反映了南方方言与古壮侗语的某些联系,

因为壮侗语的一大特点就表现在副词的语序和量词的活跃这两方面。而吴语作为南北方言的分界,也解释了上述现象中出现的向普通话靠近的趋势,而南部吴语则保留得相对比较完整。

吴语是中国境内第二大方言,有其完整的语言系统,甚至有《海上花列传》等吴语小说传世。笔者从宏观上探究了吴语与普通话的语序差异。通过将方言自身特点置于整个汉语发展史的综合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窥中古汉语乃至上古汉语的历史变迁。同时,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普通话的大力推广,吴语的语音、词汇、语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文多次提及新老派吴语的区别,很多语法现象尚处于过渡阶段。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方言最终是向共同语靠近的,但是方言蕴涵了丰富的古汉语研究价值,是地域文化的语言载体,理应受到社会各界的保护。

#### 参考文献:

- [1] 赵元任.语言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8.
- [2] 李如龙.汉语方言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30.
- [3] 刘丹青.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J].方言,2001(4):332-343.
- [4] 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5] 朱婷婷.萧山方言的特殊语序[J].现代语文,2012(5):55-57.
- [6] 林素娥.湘语与吴语语序类型比较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6.
- [7] 项梦冰.试论汉语方言复合词的异序现象[J].语文研究,1988(2):81-94.
- [8] 张巍.中古汉语同素逆序词演变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9] 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267.
- [10] 丁邦新.论汉语方言中“中心语—修饰语”的反常词序问题[J].方言,2000(3):194-197.
- [11] 钱乃荣.吴语中的NPS句和SOV句[J].语言研究,1997(2):81-92.
- [12] 颜逸明.吴语概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13] 吴子慧.吴越文化视野中的绍兴方言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 [14] 钱乃荣.上海话语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64.
- [15] 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32.
- [16] 潘国英.明清言情小说中的湖州方言语法[J].丽水

- 学院学报,2005(3):52-54. 学,2009(5):472-477.
- [17] 黄家教,詹伯慧.广州方言中的特殊语序现象[J].  
语言研究,1983(2):121-126. (责任编辑:郭红明)
- [18] 骆锤炼.吴语的后置副词“添”与有界化[J].语言科

## A Study of the Special Word Order of Wu Dialect

BU Hangb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 China)

**Abstract:** Wu dialect, the second most widely spoken dialect in China, is poles apart from Mandarin Chinese in pronunciation, vocabulary and grammar. Given the scattered current studies of the special word order of Wu dialect, 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into the dialect's linguistic peculiarities and its historical orig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verted order of compound words, the topic-prominent type, the position of objects, and the post-positional adverbial modifiers, with constant reference to the Mandarin counterparts, throwing into relief the regional traits of Wu dialect in terms of word order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This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shed some important light on the further description of Wu grammar and for that matter it is of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mmatical system of modern Chinese.

**Keywords:** Wu dialect; reverted order; topic-prominent type; object; post-positional adverbial modifier

(上接第 67 页)

- [18] 刘重德.文学翻译十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134-135. [21] 李德凤.翻译教学:需求分析与课程设置[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19.
- [19] 许钧.翻译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24-25. [22] 林克难.知人、知论、知用——从翻译理论的引用看细读原著的必要[J].中国翻译,2014(1):88-91.
- [20] 穆雷.翻译研究方法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23-24. (责任编辑:郭红明)

## Misconception About Pseudo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JIANG 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jiang Jiangsu 212003,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misconception about the term pseudotranslation in academia in China. Due to this misconception, some scholars confuse pseudotranslation with errors in translation. Some cannot draw a clear line of demarcation between pseudotranslation and genuine translation. The root of these confusions lies in the fact that logicity of definitions was not researched textually and evaluated properly when the term was introduced in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his thesis explores into the two types of confusions in pseudotranslation researches and proves that Gyorgy Rado's definition of pseudotranslation is defective. The purpose is to help researchers cultivate a healthy attitude towards newly introduce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viz., we should develop what is useful or healthy and discard what is not.

**Keywords:** pseudotranslation; Gideon Toury; Gyorgy Rado; errors i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variation